



跟随毛主席长征

陈昌奉

跟随毛主席长征

陈 昌 奉

插图：阿老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目 次

一	最初的日子.....	1
二	关于“家”.....	10
三	踏上长征第一步.....	18
四	过苗族区.....	23
五	烏江边上的新年.....	31
六	金沙江畔.....	37
七	彝族人民欢迎毛主席.....	41
八	从安顺场到泸定桥.....	46
九	向水子地前进的路上.....	52
一〇	雪山草地間.....	55
一一	六盘山上.....	74
一二	我們到了家了!.....	78
一三	主席送我入学.....	84
一四	辞別主席到前线去.....	91

一 最初的日子

一九一五年秋，我出生在江西省宁都县一个名叫岭脑村的庄子里。家里很穷，十一岁死去母亲，父亲靠给地主扛活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因为贫穷，又遭受过地主、土豪的迫害，我打从小时候起，就从心眼里痛恨那些吃人的剥削阶级。

一九二八年，田头王坊村中忽然飞传着有一支红色的队伍，像是从天上降下，穿过宁都直往瑞金、大柏地挺进。这一新鲜传说，波动了全村所有的人；越传越广，越说越神奇。穷人们听了就高兴，他们说，那是搭救穷人的队伍，名叫“共产党”、“红军”，专门“杀富济贫”，把地主、土豪的金银财宝撒在街上，让穷人自己拿；富人们听了就害怕，他们把这支队伍描写得很怕人。我那时只有十三、四岁，虽然还不懂事，可立刻就相信了穷人们的说法。“杀富济贫”这四个字，就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我的脑子里。

又过了不多日子，村中一些跑外的小贩，打从福建长汀一带回来，他们个个都兴高彩烈地谈论着新鲜见闻；他们说，长汀被红军拿到手了，他们在那里斗地主，打土豪，

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田，伸直了腰干，扬眉吐气了。我一听心里可乐了，成天价盼望着这批穷人的队伍有一天会到自己的村中来。

这一年的新年，我的家因欠土豪的钱被抄了。家里的东西，从野外的一小块土地到屋里盖的破被子，都被抢走。幸亏邻居们说情，才留下一口做饭的破铁锅。日子更艰难了，从此我就给人家放牛。那时的日子，真是连牛马也不如，牛马干完了活儿还能吃上草料，可我们一家子连一碗稠一点的稀饭也喝不上。怎么办呢？“找红军去！”——这想法也不知什么时候从脑子里钻了出来，越想越坚决。过完了春节，农历正月初二的那天黑夜，就和同村一个姓温的青年，背着家人偷偷地离开了故乡，直奔福建长汀，毅然决然地找红军去了。

不知走了多少天和多少路，也没碰到一个红军，虽然饿着肚子，决心可没动摇。走到了离长汀还有十五里的一个山岗上，我们一眼看到两个帽带红星帽徽的军人在那里站岗，“这一定是红军！”我和那姓温的立刻跑上前去，问明了之后就高声说：“我们是来当红军的！”那两个同志详细地盘问了我們之后，就指着长汀说：“那里有‘扩红队’（即扩大红军宣传队）。”要我們到那里去报名。

到了长汀，在一座大石桥上，果然碰见了“扩红队”，可把我们高兴死了，不容分说就要参加，可没想到他们端详了我半天，摇摇头，说我年龄太小，扛不动枪，不能收留。唉！为了这一点，我还哭过呢！我大声地说：“我非当红

軍不可，不让我参加我就不走！”他們看我那么坚决，终于軟了下来，从此，我就当上了光荣的紅軍。

參軍后，我被分配在中国工农紅軍第四軍（朱德同志是四軍軍長）軍部副官处当号兵，不久，又調为勤务員。

一九三〇年的三月底，我們軍部駐在江西永丰县的白沙村。一天中午，副官处的刘振庭副官把我叫去，說要調动我的工作。我問他：“調动什么工作呀？”——当时“調动工作”四个字，对我來說还很陌生呢。

刘副官說：“調动工作，就是要你从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。”說罢，两眼端詳着我，似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能馬上告訴我。

“去哪？”我心里有点不高兴，在这里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又要調动工作呢？

“調你到前委去，給毛委員当勤务員。”刘副官說完，滿面笑容地望着我。

“前委”是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員會的簡称，这我知道。可这位毛委員是誰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不用說，他是个首长，不然怎么能够有勤务員呢？可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的脾气好不好呢？

刘副官見我犹疑不定，大約猜透了我的心事，走到我面前来，双手扳着我的肩膀說：“小鬼，你應該高兴，那位毛委員是再好不过的人啦，你跟着他。将来一定很有出息。”他說完就給我开介紹信，让我整理东西，准备去“前委”。那时行装很簡單，連被子带衣服加起来不过三斤重。

“前委”和我們住一个村，不一会就到了。

到了“前委”，一位个子挺高的同志領我去見主席。我心里很緊張。一边走一边想：这毛委員什么样？是不是和我們軍长一样，粗粗的眉毛，滿臉大胡子……院子挺小，想着想着就到了主席的房子。主席住的是江西那种小樓式的木房子，一共两間，一間是宿舍，一間是办公室。我們从宿舍門进去，一打眼就看見一張普普通通的木板床，上面鋪着一條洋布被单，連个枕头也沒有。我緊張的心一下子松开了，心想：看这房間的布置，这人和我們差不多。走进办公室，見有两个人正在談話。領我来的那位同志指着坐在椅子上的一个人說：“那就是毛委員。”

我向前走了一步，好奇地望着这个人：他穿了一身和我們一样的灰色軍装，和我們不同的是他那軍装的口袋似乎特別大。沒戴帽子，留一头烏黑的长发。不知因为他头发特別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他的臉显得特別白。也許因为太瘦了一点，一双眼睛显得又大又有神气。看样頂多有四十岁。他正在用手比划着和对面一个人談着什么。声音挺柔和。談的什么我虽然听不明白，但却觉得十分亲切。不一会，对面那个人站起来，他也站了起来。我这才发现他的个子很高大。

等那人退出去之后，領我来的同志把我引到他面前說：“毛委員，給您調来了个勤务員。”他轉身指了指我。

我虽然心里有点拘束，但在軍部学的一套礼节还没疏忽，赶忙上前打了一个敬礼說：“报告！”

主席望着我笑了笑——他笑得是那样慈祥、温和。这一笑把我原有的拘束一扫净光了。

“你姓什么？”主席問。

“姓陈！”我大声回答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陈昌奉！”

“陈昌奉！”主席慢慢地說：“十几啦？”

“十六岁！”这时我回答的声音自然一些了。

“为什么当紅軍呀？”主席像老师考問小学生似地問我。

“紅軍好，打土豪！”我还是立正站着。

主席指着一把椅子，示意让我坐下。很有兴致地問我：“你們家乡有土豪嗎？”

“有！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。”我說着，就把我的家庭情况和怎么参加紅軍的事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。我发现主席很注意听我讲，不时地点头并微微发笑。这給我很大的鼓励，我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很好，一点也不拘束，所以話說得特別多。直到領我来的那位同志在后边用手戳了我一下，才发觉自己說得太多了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很好！”主席对我說：“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。”他停了一下又問：“你能写下自己的名字嗎？”

我站起来，揉搓着自己的衣角，帽舌头下的用双眼偷偷地望着主席，小声地說：“我沒念过书，不会写字。”停了

一下又馬上补充似地說：“您写了，我会认的。”

主席笑着站起来，走到我的身边說：“以后要学会写，要会写自己的名字，也会写許多人的名字，願意嗎？”

“願意！”我低声回答。

主席轉过身去，对那位带我来的同志說：“这是新同志，你們要好好地帮助他！”随后又轉过臉来对我說：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問他們。”

我跟着領我来的同志剛下楼来，他就拉着我說：“你怎么說起来沒有头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觉得我說得不多，好多話还没有对他說完呢！

“你知道他有多忙嗎？”

我搖搖頭，表示不知道。

“他可忙啦！”他說：“你要記住，在他看文件的时候，可不要吵，不要弄得滿处乱响。还有，他每天晚上总要工作到深夜，第二天的早飯要晚一点打。懂嗎？”

“懂了！”我高兴极了。当天晚上兴奋得一宿沒睡好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同屋的同志都問我夜里作了什么好梦，連說連笑。我朝他們做了个鬼臉，提起小木桶打洗臉水去了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还是昨天带我見主席的那位同志問我。

我理直气壯地說：“給毛委員打洗臉水呀！”

“你看！”他显出生气的样子說：“不是告訴你了嘛！毛委員睡得晚，不要弄醒他吧。”

我放下木桶，知錯地笑了。后来，我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早上打了水，輕輕地提到楼上，我自己就坐在小樓門口的一个小吊椅上，靜靜地等着主席的吩咐。可主席却很少叫我，就这样一連坐了好几天。

有一天，主席洗了臉就問我：“陈昌奉，你怎么老坐在那里不动呀？”

我扶着搖晃的小吊椅說：“怕您有事，找不到我。”

主席笑了笑，象对孩子似地說：“以后不要光坐在那里了，有空就去和大家一块学习。我没有更多的事要你做。”

那时差不多天天要打仗，到处流动，在一个地方頂多住个把月。主席的生活很簡單，很快我就摸熟了他的生活习惯。那时主席的全部行装是：两床毯子，一条洋布被单，两套和我們战士一样的灰軍服，一件銀灰色的毛衣。用的东西是：一把破雨伞，一个吃飯用的缸子，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。主席用的地图、文件、书籍等，全部装在这个挂包里。每当行軍作战，他背着挂包拿着雨伞，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。到了宿营地，找两块木板对起来，鋪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，用衣服打成枕头，这便是他的臥鋪。

主席晚上睡覺很少，吃过晚飯便点上小灯（这是一个小馬灯，行軍时做路灯，住下便用磚头垫起来办公用），打开那个九层的挂包，拿出文件、地图、书籍和紙、笔就开始工作，有时一直到天亮。有名的“查田运动”，就是从那时

开始写的。

我那时年龄小，不能熬夜，主席看书、写字，我就在旁边坐着，不一会就睡着了，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睡来。每当主席推醒我时，我们俩就都笑了。于是主席就叫我去休息。

夏天，常常在半夜时分，他轻轻地把我叫醒，说：“搞点水来吧！”我这才醒来，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。因为没有脸盆，他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，有时擦擦澡，提提精神。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，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“三层饭”——最底下一层是米饭，中间是一点菜，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——去热一热给他吃。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，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，留着下顿再吃。一次，我把他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。第二天他便问：“陈昌奉，昨天剩下来的饭呢？”我照实说了，他批评我说：“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，下次剩的不准倒掉，留着下一顿再吃。”

那时整天行军作战，主席有时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，我心里很着急，总想给他搞一个暖水瓶。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地方，得到了战利品，主席不是把送给他的东西给战士同志，便是送到医院里去给负伤的同志，自己从来不要。一九三一年冬天，我们打开了江西吉安，我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了个搪磁暖水瓶，心里虽然高兴，可又怕主席知道，一行军，我就把它交给别人带着，以防备主席发现。有了这个暖水瓶，喝水不成问题了，可吃饭还

是不方便。那个小缸子盛夜餐还可以，一行起軍来就不行了。有时候打一仗我們就走，走到中途大家都休息吃飯了，主席却还是用那个缸子吃“三层飯”。

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了。他当选了共和国主席——从那时候起我們对他的称呼才从毛委員改成毛主席——但他那时吃飯还只用一个小缸子，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，我們打开福建漳州，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磁飯盒。我高兴极了。提着飯盒，抱着“保密”的暖水瓶走到主席面前說：“主席，您看我們什么都有了。”

二 关于“家”

每当我们打开一个县城或集镇，主席时常派人或亲自领着我们先去敌人的县（镇）政府，找敌人的档案文件，再去当地的邮局，买报纸和杂志。往往我们空着手跟他出去，转一圈回来，每个人都背一大捆书报回来。当天晚上主席用红笔划出记号，我们便照着剪下保存起来。

一天，我们到了江西的信丰县。这地方过去我们来过几次，老百姓都知道红军好。虽然也是经过战斗才进来的，可老百姓一个也没有跑。街面上的商店都开着门，好多老百姓都出来欢迎我们。

刚住下，主席便对我说：“陈昌奉，走！到邮局去！”

我跟着主席往邮局走去。信丰这地方虽然不怎么大，街面倒还繁华。红军这一到，街上就更加热闹。三个一堆五个一簇的人，在太阳底下聊天。几个五、六岁的小孩，围着一个战士，他正指手划脚地给他们讲些什么。正走着，忽然碰上了我们的司务长，他手里提着一大块牛肉。我连忙拦住他轻轻地說：“司务长，给我们留点！”司务长点点头，然后戳了我一下說：“首长哪？”我抬头一看，主席已经走出好远，快到邮局了。我朝司务长伸了伸舌头追

了上去。

邮局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就是个贩卖书报的商店，至于别的，当时我是不怎么清楚的。

到了邮局，主席开始在一大堆书报里翻着，不时挑出几本书、几张报递给我。

付好钱以后，我一边整理着书报一边问主席：“主席，这邮局都管着些什么？”

“邮局管得可多啦！”主席对我解释说：“送报、送信、打电报、打电话都要他们。你要是给家里写信，它就会给你送去。”

“我给家里写信它也能送到？”从邮局出来，一路上就想这件事。这可太好了！算算我离家也有二、三年了，家里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呢？父亲还在吗？他怎么活着？……许许多多的问题，一下子涌到脑子里翻腾起来。要是能给家里写个信该有多好呀！

回到宿营地，天已晚了。放下书报，给主席点上灯，他就开始翻阅起来。按时间我该给主席打饭去了，可由于“邮局问题”，搞得我脑子里挺乱，光想着这件事，竟站在主席面前发呆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主席看我神色不对头便问道。

“主席，”我说：“我家的信，它也能送到吗？”我把“我”和“它”说得特别重。

“谁呀？”主席问。

“邮局！”

“能！你家也是苏区了！”主席了解了我的問題，接着說：“想給家写信了嗎？”

我点点头。一面走上前去輕輕地說：“主席，我想給家里写封信，可是……”

“写不来！”沒等我說完主席便接上說：“来，我給你写。”

一听主席要給我写家信，可把我乐坏了！可又一想，主席这样忙，还要耽誤他的時間，心里有点不安。我正为难，就听主席說：

“你想告訴你父亲些什么？”說着就推开报纸，拿出信紙来。

“我……”是呀！我对父亲說些什么呢？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了。我說：“主席，你看着写吧！反正談我在紅軍里好，跟着您好，很好很好就是了！”主席又問过了我家的詳細地址和我父亲的名字，我就打飯去了。等我打飯回来，看見主席一手托着腮，一手拿着笔在思考着什么。我知道，这时請他吃飯是不合时宜的，便把飯盒子輕輕地放下走了出去。

我躺在松軟的稻草鋪上，覺得全身热得很，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想着我自己，想着主席。我，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，参加了自己的队伍，当了共和国主席的警卫員（那时我已由勤务員改为警卫員）；現在居然由主席亲自給我写家信，几年来，主席对我各方面——从生活到学习，一直象慈父般地关怀，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恩师呵！

就这样想呵，想呵，眼泪竟不由人地顺着两颊滴在稻草上。夜深了的时候，我又跑了出去，望见主席屋里的灯还亮着，他还在工作呢！那一夜我没有睡好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端着饭走进主席的办公室，他拿着那早已写好的信，交给我说：“信写好了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我连忙放下饭盒，双手接过信来，惶惑地说：“行！这还能不行！”

“快送邮局发走吧！”主席催促着我。

“您在吃饭哪！”

“不要紧，快去吧！”

我突然敬了个礼，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跑出了主席的办公室。

回来后，主席望着我说：“这可放心了吧！还想家吗？”

我傻笑了一会说：“不想了！您叫我回家，我还不回去呐！”

一九三三年秋天，部队攻打建昌府的时候，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到了广昌。广昌这地方离我的家乡宁都已经比较近了，回家看看的念头一下子冒出来了。到达广昌的第一天，我便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到广昌府我可熟了，要是回家看看，我可认得路呐！”

主席朝我微微一笑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慢一点嘛，越走越离你们家越近。”

“真的！”我大声地说出这两个字，高兴得心都要跳出

来了。

两三天以后，我就跟着主席到达了我久别的家乡——宁都县；到达宁都是下午两点钟左右。主席就住在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那里。一住下，主席就把我叫去，拍着我的头说：“想回家不？”

“……想。”

“好！”主席说：“这几天我在这里开会，你回家看看。”主席说着停下来，望着我问道：“要多少天？”

主席一说让我回家，我脑门里轰地一下热了起来。他这一问，我一时无从回答。于是主席伸出了一双大手说：“十天，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好！”说罢就想走。但当我刚要挪动脚步时，陡然想到我回家之后主席吃饭、喝水谁来照顾呢？“不，主席，我不回去了！”我说。

“怎么啦？”主席好奇地望着我。

我说：“我回家您吃饭、喝水怎么办？”

主席笑着走到我的面前，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慈爱地说：“去吧！回家看看，回来工作就更有劲儿。你们家也是苏区了嘛！”他停了停，又对我说：“回来不要到宁都来找我了，直接到长汀去，我在那里。”

我点点头，还是不想走，心里矛盾得很，老觉得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好，很不放心似的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心一直很激动。家……主席……主席……家……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。夕阳下，沿途的